

們就應該致力於維持不同敘事方式間的妥善共存，防止出現僭越話語界限的霸權情況產生。因此社會學的研究理論和研究方法，也不應有主流和非主流之分，任何社會學說都有其產生的特定話語環境，都是平等的話語類型。正如利奧塔所說：“沒有任何事物有和諧可言，因為沒有任何事物能是第一或初始原則。任何話語，包括科學的，都僅僅是一種觀點，一種世界觀”。¹⁷

（三）利奧塔有助於我們實踐差異的微觀政治學。利奧塔向我們指出，現代性的癥結在於人類不放棄的總體性追求與科學技術話語的霸權，政治倫理領域無疑也遭到了它們的侵殖。總體性追求使得人類總是渴望道德上的普遍法、永恆律，科學技術話語的宰製使得知識成為道德判斷的依據，它們都遭到了利奧塔的批判。而異教主義把時間和語境納入參照範疇，用局部的道德共識指導信仰者的行為，利奧塔認為這種微觀政治學模式應該是人類政治行為的出路。因為絕對的共識無法實現，所以利奧塔認為政治家無法實現絕對的善與公正，“較少的罪惡就是政治上的善”。¹⁸如何做到較少的惡？答案便是給予政治團體和政治訴求平等的尊重與傾聽。在社會學研究中，政治同樣是極為重要的思考維度之一。我們應該注重正義、公平、團體、階層、權力、統治等政治概念的微觀語用變化，與宏觀結構考察相結合，另外還可以幫助提倡協商、懇談、介入、援助等寬容差異的微觀政治實踐，以便不斷完善人類的政治治理。

注釋

- 1 理查德-羅蒂，〈哈貝馬斯和利奧塔論後現代性〉，李文閣譯，《世界哲學》第4期（2004），4-13。
- 2 讓-弗朗索瓦·利奧塔，《話語，圖形》，謝晶譯（上海：上海世界書局出版集團，2012），157。
- 3 同上，160。
- 4 同上，263。

